

周而復文集

难忘的征尘

周而復 文集 ②

难忘的征尘

文化藝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难忘的征尘/周而复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4

(周而复文集·第2卷)

ISBN 7 - 5039 - 2501 - 9

I . 难… II . 周… III .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805 号

难忘的征尘

周而复文集 (第 2 卷)

著 者 周而复

责任编辑 向 宏

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 数 48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501 - 9/I · 116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周而复像，摄于1938年

序

报告文学（Reportage）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1923 年出版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次年出版的《赤都心史》，可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滥觞。1925 年上海发生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茅盾所写的《暴风雨》、叶绍钧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和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都是为了反映这一重大的社会意义的斗争题材，把南京路上发生的真实情况及时报告给广大的国内和国外读者，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战斗气息，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注意和欢迎。

但正式提倡这一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形式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号召进行“工农兵通信运动”，1930 年 8 月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地和革命斗争一道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有切实的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意识。”从“左联”号召创作报告文学的要求上看，不只是提倡一种文学形式，而是要文学“成为大众的所有”，“和革命斗争一道发展”，作家

的生活“切实的改变”，以达到作品的内容“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意识”，把报告文学提到这样的高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任务，也就是革命的文艺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接着，在“左联”领导下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阐述报告文学的理论文章和作品。当时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刘志清（即柔石）所写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反映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严肃的战斗生活，是一首豪迈而又壮烈的赞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它的侵略矛头对着上海，遭到上海广大军民的坚强抵抗，一些作家也深入前线，发表了不少生动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适夷的《战地的一日》、《向着暴风雨前进》，沈端先（夏衍）的《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洪深的《时代下几个必然的人物》等。

到了1936年，报告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篇章，传颂一时，夏衍的《包身工》，洪深的《天堂里的地狱》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抗日战争的烽火点燃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纷纷走上前线，众多的作家“带笔从戎”，既是文艺工作者，又是前线战斗员，奔走在前线和后方，不管在国民党统治区或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称解放区）都有许许多多的作家的足迹，他们生活在军队和人民当中，从事报告文学写作。

报告文学属于叙述真人真事的散文作品，适于迅速地反映重大社会意义的生活题材，具有战斗性和群众性，洋溢着时代的气息。报告文学可以集中叙述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事件，也可以叙述某些人物的生平或者一段生活。当然，这不可能截然分开，事件中一定有人物，人物活动中也有某些事件；为了感染读者和提高文艺的效果，必要的环境描绘和气氛的渲染，也是可以的，甚至夹叙夹议，也未可厚非。报告文学必须是真人真事。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虚构是报告文学的致命伤。因此，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自然，新闻稿件并不都是报告

文学。

苏联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曾经写了一篇关于“镰刀与锤子”工厂选举的作品，其中写了一个老工人库兹米奇，有这样的情节：“他早早地起来了，穿上节日的盛装，刮了脸，仔仔细细地梳了梳头发。”库兹米奇摘了帽子给波列伏依看：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波列伏依从此坚信不疑：“一个新闻工作者在报纸上写文章，在任何地方写文章，甚至是写艺术特写，他都不能也没权利展开幻想的翅膀，即使在细节描写上，也应该做到准确无误。要知道，任何一种哪怕是考虑最周全的杜撰，任何一种用来修饰和渲染素材的虚构的细节，都会破坏使报纸通讯有力量的主要东西——真实性。”所以，他提出来：准确，准确，再准确！

伟大的剧烈变动的时代，人民大众渴望从文艺作品方面看到这个时代的面貌，而长篇巨构需要有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并且一般总是在这一变动的伟大时代若干年月以后才能产生，于是报告文学便承担了这个崇高的光荣任务，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不妨比作新闻和文学结合的产儿。

波列伏依便是一个例证，他是新闻记者，也是报告文学的作者（有时也称自己的作品是艺术特写），更是著名的作家。

外国不少作家曾经是新闻记者，最初大半写些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一类的作品，然后才从事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除了上述报告文学作用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特别是要了解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反映社会，从事创作，这是不言而喻的。记者就是熟悉和了解社会生活的途径之一。

任何作家都有他的初期创作活动，或者说进入作家队伍以前的准备阶段，除了生活这个根本问题以外，文学艺术的修养（包括社会科

学在内)、创作技巧的锻炼是必不可少的。短篇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之类的写作，正是练笔的恰当形式之一。

由于这些原因，不少新闻记者后来成为作家，狄更斯便是其中之一。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新闻记者都要成为作家。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和伟大的代表者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青年时代曾经做过报社的新闻记者，这时正以 1832 年的议会改革为中心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他采访议会，了解到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斗争的丑恶内幕，厌恶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用特写的文学形式把它反映出来。1836 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特写选集，用的笔名是博兹 (Boz) 而不是狄更斯。这些新闻记者的特写受到读者的欢迎，引起出版界的注意，请他为描写城内第一号人物准备参加户外运动的连环图画写文字说明，于是诞生了《匹克威克外传》这部著名的小说，登上英国文坛，终于成为伟大的作家。

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人民投入救亡图存的斗争高潮。热爱祖国的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和理论家，都踊跃地参加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行列，有的担任新闻记者，有的在抗战部队和各个岗位上工作，有的是作家活跃在前方(包括敌后)和后方，用具有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报告文学的形式，把亲身所见所闻的千变万化的伟大现实斗争生活及时反映出来，鼓舞广大的群众和浴血奋战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形成了报告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时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看来也不失去它的社会意义和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不少优秀的作品和其他形式的作品一样都是可以流传下去的。有些作者，在自己当时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以后又创作了小说和戏剧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

我在文学上所经历的道路也有某些近似。

20 世纪 30 年代，我曾沉醉在英国、法国和旧俄 18 世纪与 19 世纪

的文学作品里，翻译过一些短小的英国和美国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论文，我就是从英文译本转译屠格涅夫的一部中篇小说来代替的。这个译本收存在光华大学，没有出版，译稿大概被遗失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发表在茅盾为“文学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里。高尔基曾经主编过《世界的一日》。《中国的一日》便是仿照这个体例编辑的。文学社事先确定 1936 年 5 月 21 日这一天的全国各地的生活实况和社会见闻为文章内容，企图通过这一天的横断面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的面貌。文学社收到三千多篇文章，估计有六百万字左右，蔚为大观。经过编选并由茅盾定稿一共收了四百九十篇，约八十万字。“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

（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

1936 年 5 月 21 日这一天，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习作，题目是《在深秋一样的马路上》，一千多字。

1938 年夏天，我离开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孤岛——上海，经香港、广州、武汉、西安，步行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应上海译报负责人王任叔的约稿，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寄给译报发表，可以说是译报临时特约记者。这些稿子寄出去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但有的朋友告诉我曾经在译报上看到过我的文章。这说明我的稿子没有为洪乔所误。

作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政治部第五文艺小组组长，我和这个小组成员诗人鲁藜一道，从延安出发，渡过波涛汹涌的天险黄河，经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派部队护送我们二十几个人（除了第五文艺小组以外，还有其他部队的干部）过同蒲路封锁线，一天一夜步行了一百多公里，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在军区见了聂荣臻司令员和政治部主

任舒同同志，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和鲁藜分手了。他到第四军分区去了。我先留在军区，不久敌人大军分几路进山“扫荡”，我立即到了第三军分区的一个主力团，记得这个团的代号是“季家湾”，和他们一道参加反“扫荡”战斗。

我随着“季家湾”一道反“扫荡”，有时到营部去，有时到连部去，和战士一同生活。在火线上，我看到在我们轻重机枪火力的扫射下，许许多多戴着钢盔的敌人倒了下去；我看到边区子弟兵虽然身上挂了彩，鲜血染红了草绿色的军装，仍然坚持在阵地上，不断射击敌人，并且不喊一声痛；我看到随着部队一同行动的边区自卫队员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带着轻便的担架，随时准备抢救运送伤员；团长带着通讯员、司号员和警卫员身先士卒，亲自在火线上指挥；我身上带着一支手枪和两颗手榴弹，和团长一道行动，尽可能协助他做点微末的工作……

瞬息万变的惊心动魄的战斗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边区人民和他们的子弟兵用自己的鲜血和骨肉，随时随地筑起一段又一段铜墙铁壁，连接起来便是一道道新的长城，使我来不及深入酝酿反复构思，反“扫荡”的生死存亡激烈的斗争要求我尽快地把这些英雄事迹报导给边区子弟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我便写一些千字左右的短小篇章寄给《子弟兵》三日刊编辑部发表。这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四开刊物，是石印的，一直发行到连队的战士手中。虽然是在频繁的战斗中，仍然坚持出版，这种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指战员们从《子弟兵》报上看到自己的部队和兄弟部队的英勇故事和辉煌成果，不断得到鼓舞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

从1939年到1942年，我和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人民群众一道过着战斗的生活，他们用血肉在创造历史，我用笔记录下他们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回到延安，我写了《海上的遭遇》以后，晋察冀边区军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白求恩大夫的英雄业绩，不断在我脑海里出现。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逝世五周年，我写了《诺尔曼·白求恩

片断》，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4年冬天，周恩来同志派我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去后并没有担任报纸工作，我参加党的机关杂志《群众》半月刊的编辑工作，有时为《新华日报》副刊写点关于晋察冀边区战斗生活的短小报告文学作品，也应别的刊物约稿，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主要在《群众》连载，最后编成一集《晋察冀行进》，以后改名《晋察冀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的见闻。

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面代表组成，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组织上派我任《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的特派员，过了半年多的新闻记者生涯。我到过张家口、集宁、沈阳和东北解放区，除了旅顺、大连和鞍山以外，几乎走遍了东北解放区的主要城市和一些乡村。

我还随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位将军巡视华北、华东和中南一些有争议地区的执行小组的工作情况，使我有机会接触各方面的代表和高级官员与群众，看到国民党反动当局与美国方面合演的双簧把戏，不久，一场历史的暴风雨便来临了。

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到上海，住在马斯南路“周公馆”里——是中共上海办事处，习惯上称作周恩来公馆，简称周公馆，等待《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由于国民党千方百计阻挠，迟迟得不到批准出版。我利用这段等待出版的时候，把东北所见所闻，写了两本长篇报告，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东北横断面》和《松花江上的风云》；后者先在上海《时代》杂志连载，以后出版单行本。

周恩来同志深知国民党对和谈缺乏诚意，不过举着和谈的幌子在暗地里进行内战的准备，《新华日报》在上海已无出版的希望，预见和谈破裂的局面将要到来，便把干部分别派到香港和解放区去，只留少数人坚守上海的岗位到最后的时刻。1946年夏天，我踏上一艘美国“总统号”的客轮，到了香港，和冯乃超等同志在英皇道一幢刚建成不久

的楼房里住了下来。以后夏衍和胡绳夫妇到了香港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当时位于海边的英皇道十分安静，工作也不算繁忙，遇到空闲的时候，我坐在斗室里，仰望窗外晴空，浮想联翩，晋察冀战地生活景象纷至沓来，各种人物的生动形象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于是酝酿，构思，创作小说，首先写出《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1944年所写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报告文学，完全是真人真事，不允许展开幻想的翅膀。但小说不同，作者可以概括集中，甚至在现实生活的基本上允许有合理的虚构，幻想的翅膀可以飞翔了。当然关于白求恩同志本人的事迹，基本上是如实写来。接着，我又写了《燕宿崖》和《西流水的孩子们》两部小说。这以后，我业余时间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写长篇小说方面，写的报告文学比较少了。

但是，1964年春天，参观大庆油田，我看到那些惊人的伟大的建设业绩，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又拿起笔来，《荒原春色》便是歌颂大庆人艰苦奋斗取得丰硕成果的报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10月，1978年10月举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和马玉槐同志的邀请，我前去参加庆祝筹备文艺方面的工作，他们还安排我参观一些城市、厂矿企业和名胜古迹，畅游了贺兰山、六盘山和单家集等处。在宁夏停留了两个月左右，我写了《万国强跨进一九八四年》等篇。

从1936年5月写了那篇类似报告文学的小文章，屈指算来，五十八个春秋消逝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已经搜集到的，加以编选，基本上都收到这个集子里了。从这个集子里，可以看到伟大的时代历史巨变的某些足迹。

李白在《哭晁卿衡》七绝里有这样一句：“征帆一片绕蓬壶”，而我却是征帆一片绕九州，几乎跑遍了全国，只有个别省和自治区没有去。这几十年来，经常奔走在风尘中“行遍天涯千万里”（陆游），且不说还到许多国家访问，真个是席不暇暖，正如刘秉忠所歌咏的那样：“五更残月照征骖”。不论是拂晓，还是夜晚，经常在征途上。在敌后

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一夜宿营地常常更换两个甚至三个地方，刚宿营，又集合出发了，因为发生了情况。反“扫荡”的时候，我们宿营不脱军服和草鞋，随时可以行动，有时一夜行军三四十里路，躺到炕上睡下不久，到了“五更残月”的时候，又出发了。转瞬之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正如陆游歌咏的那样：“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往事，确像诗人王勃吟咏的：“谁忍忘征尘”。别人是否这样，不知道，但我欣赏王勃这句诗。征尘，谁忍忘？谁又能忘？

1994年4月24日

北京

目录

.....	1	序
.....	1	在深林一样的马路上
.....	3	从上海到香港
.....	8	粤汉途中 ——列车——在恐怖的 原野上行进着
.....	14	长沙印象
.....	18	武汉一瞥
.....	25	文化的尖兵
.....	30	孤岛上的文化
.....	35	黄土岭的夕暮
.....	41	开荒曲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 开荒剪影
.....	46	侵略者的最后 ——百团出击散记之一
.....	53	消灭 ——百团出击散记之二
.....	57	一支农民的哀曲

.....	60	海上的遭遇
.....	74	北平西郊一带
.....	80	诺尔曼·白求恩片断
.....	113	地道战
.....	125	罗连长
.....	132	人民文化的时代 ——陕甘宁边区文教运动的成果
.....	162	晋察冀行
.....	224	北平印象
.....	228	争论中的集宁
.....	230	塞外风光
.....	235	中国的心脏衰弱了
.....	241	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 巡视华北记
.....	264	三千万人民的舵手 ——聂荣臻将军
.....	270	贺龙将军印象
.....	274	天才指挥家 ——刘伯承将军

..... 279	访吕正操将军 ——谈东北民主联军
..... 286	月亮上升的时候
..... 304	东北横断面
..... 435	松花江上的风云
..... 534	荒原春色
..... 559	贺兰山上花烂漫
..... 584	煤海春潮
..... 589	万国强跨进一九八四年
..... 610	记者生涯的回忆

在深林一样的马路上

晚上 10 点钟，三个人在徐家汇站了好一会儿，大家商量：能够叫一部祥生汽车回到我们那个所谓家里去，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把三个人身上的钱集拢起来也不过是四毛小洋的样子，给汽车的小账是多一点，可是给正账却差得很远。走回去当然也是顶节省的办法，然而据说有点不方便；结果还是坐洋车的意见通过。

街上很黑，天上也不过只有几颗零落的星星，靠着洋车上微弱的豆油灯的光亮，向深林一样的马路上前进。

虹桥路白天走的人就不多，黑暗走的人当然就更少了。不讲行人，连警察的影子也看不见，静静地，街边两排树一个靠着一个地伸下去。树根上端部分涂着白粉，更显得上面的树叶很黑，有时在转角处，乌黑的树叶里也偶而显出一点凄黄的灯光来，有气无力地照着柏油马路。

我们在车子上三个人谈天、扯淡，三辆车子并在一块儿走着，在静寂的空间只听见车夫的脚步声和我们的谈话声。

没有一刻钟的功夫便到了铁路，一盏血红的灯横在我们的眼

… 1 …